

冀南革命斗争史料

(第二辑)

中共邢台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

冀南革命斗争史料

第二辑

中共邢台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

说 明

为完成河北省委交给我区编写原冀南地方党史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邢台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自1981年11月起开始收集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并以《冀南革命斗争史料》为刊名按时期分别辑印成册。由于原冀南管辖范围的变更和与现今区域划分的交错，我们目前所辑印的材料，只是现属邢台地区各县份所收集到的，而对当时属于冀南，而现属我省邯郸、衡水两个地区以及山东的德州、聊城地区部分县的有关史料，因暂不掌握，尚未辑印其中。同样原因，本辑中所刊印的革命回忆录，基本上也都是本地或原籍在本地区的一些老同志、老干部所回忆、撰写的。为了将来使冀南地方党史从内容上编写得更全面、更充实、更符合历史实际，恳切希望邯郸、衡水、德州、聊城等地的党史资料征集单位，尽可能地把有关史料提供给我们。如偿此愿，不胜感激。

本辑中所编选的革命回忆录，其中不少篇幅系1959年和1960年所记录、整理的，而且大都未经本人复审核对，故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

在这里除向作者，整理者表示谢意外，更希望得到本人及亲属和整理者的指正和补充，以求史料进一步完善、准确。

根据一些老同志和读者的意见，我们对《冀南革命斗争史料》的封面设计、开本以及文中所用字号等方面，均作了必要的调整和改进，在此一并说明。

编 者

1982年7月3日

目 录

回忆冀南人民的革命斗争·····	李菁玉 (1)
党在任县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	刘子厚 (10)
任县建党及其与邢台中心县委的联系 ·····	陈济生 (22)
关于磁县革命斗争的回忆片断·····	李亚光 (27)
隆平及直南建党情况的回忆·····	朱林森 (33)
隆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霍子瑞 (41)
回忆邢台中心县委的一些情况·····	喻 屏 (50)
党在邢台四师的建立与活动·····	王邦彦 (52)
我所知道的邢台四师党的活动情况 ·····	刘宁一 (58)
回忆党在巨鹿一带的革命斗争·····	程玉琳 (61)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孙光瑞 (87)
回忆党组织在平乡的建立和发展情况 ·····	张风田 (114)
平乡盐民游击队的两次战斗·····	李 风 (123)
我的回忆·····	潘笑圃 (127)
党在威县的早期活动·····	李华北 (141)
回忆王一夫同志·····	中共威县县委组织部 (145)
党在南宫的早期活动·····	宋之光 (151)

回忆南宫师范学潮片断·····	云凤桐(164)
南宫师范学潮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王玄(169)
回忆我的故乡——和生店村的斗争片断·····	王玉考(179)
1931、1932年南和县两次农民暴动·····	高子彬(186)
回忆冀南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片断·····	吕志清(188)
智取郝家屯兵局子·····	李子绳(193)
冀南淦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张子政(197)
组织农民向豪绅地主的斗争·····	刘风魁(212)
回忆与纪念·····	李三顺(218)
抗战初期党在威县的活动情况·····	李光军(240)
回忆垂阳县的抗日斗争情况·····	常中方(244)
回忆南宫县抗日斗争片断·····	白永涛(253)
柏乡县抗日活动的回忆片断·····	张平(259)
难忘的“四·二九”日寇大扫荡·····	李寿彭(262)
抗日堡垒村——王道寨·····	张伯翔(271)
对争取和瓦解伪军工作的回忆·····	杨铁宽(274)
全歼敌特务二旅记·····	崔绍武(283)
炮楼上天·····	何耀明(287)
回忆曹村战斗·····	郭华轩(312)
智取大吕寨、大寨炮楼·····	刘义民(315)
回忆抗战时期的亲历片断·····	刘寿山(319)

回忆冀南人民的革命斗争

李菁玉

在旧社会，我家庭贫苦，没有别的出路，所以非参加共产党搞革命不可。我十八、九岁时，在山东小军阀刘珍年部军官学校当学兵，那时，军校中已有党的组织，而且活动得很红。1929年，经张锡珩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并任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关系受烟台市委领导。后来，我因搞革命活动被军校开除，先到天津待了一个时期，1932年又展转武汉，因没有找到党的关系，才返回南宫老家。

回家后，先到南宫城内毛氏小学与张霖之同志接头，经张向特委报告，便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当时，南宫党组织是特支，张霖之任书记，党员有宋之光、曹连群和南宫中学、南宫乡师的几个同志，后来又发展了王金丘（即马国端），组织关系受威县县委潘笑圃他们领导。后来，组织上考虑霖之同志当着小学教员，不便于离职到外面活动，而我没有正式职业，到各地活动比较方便。因此，特支书记就改由我担任。怎样进行革命活动呢？首先得搞个正当职业，取得合法身份。那时党的活动

范围大多是在小学教员中间，可我仅是小学程度，当教员自己又干不了。于是，同志们给我凑了一些钱，买了辆自行车，以卖书为掩护，到各地串校进行活动，特点是先城镇，后乡村。在这段时间里，我组织过小学教员联合会，带领会员到国民党县党部请愿，要求增加工资。在我当特支书记期间，直南特委曾派刘大风（后改叫安明，在广东省工作）来南官巡视工作，以后，王卓如同志也来过。

半年后，除已有几个城镇支部外，又发展了两、三个农村支部，于是建立了南官县委，我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团县委书记是宋之光。县委建立后，接着又在曹家庄、北贾城、王道寨、关庄等村发展了高志学（是我们发展的最早一个农民党员）、鲍海芳（后牺牲）、鲍济生（现居北京市）、鲍国珍（在北京市工作）等党员。此时和生店、西康村也有了党员和组织，如马国瑞等。

不久，县委又改为中心县委，我仍任书记，负责南官、威县、清河、广宗、巨鹿、丘县几个县党的工作。当时管辖的面积虽然很大，实际并没多少人。巨鹿城西的进虎寨，城东北的南、北旧城、石鹿等村有党的支部；威县郭森同志的家乡也有支部；广宗的槐窝、件只、李家庄等村也有党员。

1932年至33年，革命群众运动在冀南20多个县

先后搞了起来，到1935年形成高潮，中心地带是南宮和巨鹿。1933年阴历年底，特委调我任磁县中心县委书记，我先到彰德府（今安阳市）找到特委书记王子青，才知道是因磁县搞暴动失败，党的组织垮了，让我去做恢复工作。

当时，那里群众的情绪比较低落，原来的党员暂时不敢露面，同组织有联系的仅有马头镇一个姓刘的交通和关庄洼王维纲同志的内弟董某。此外，还有个田裕民，那时他还不是党员，只是与我们有联系的赤色群众。我到磁县后，先住在六河沟的一个起伙店里，找到一位工人党员老胡。以后，通过老胡我结识了许多人，并与纪德贵（工人领袖）取得联系。此时，正逢唐山煤矿工人大罢工，六河沟的工人也自发地起来，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为了帮助和支持工人斗争，我们写了一些标语、传单，趁工人集会时散发。国民党当局一见传单，说是有共产党捣乱，就禁止工人开会。抓了一批工人，斗争就失败了。主要因为当时不懂得斗争策略，所以一开始就碰了钉子。如果策略对头，本来是可以利用工人自发的斗争形式，取得胜利，团结工人，发展党的组织的。直到1937年6月在延安白区工作代表会议上，受到少奇同志的批评，才认识到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作怪所致。这样，我们在工人群里呆不

住了，于是就 and 纪德贵住到山窝里他干娘家中。这时，听说彭城的工人王老二、王老四、老焦、老韩和知识分子黄拐子、李相农还活动着，于是，我们就向北发展，做恢复彭城的工作。

后来，我又到峰峰矿，住在一个姓孙的工人家里。当时峰峰矿有些从外地派来当工人的党员，如李山（即贾振丰，二师惨案时保属特委秘书长）还有几个大学生。特委还从威县、巨鹿调去几个党员下井挖煤，如田普航等。在峰峰，我们曾领导两次推煤斗车工人增资斗争，一次取得胜利，一次失败了。以后，我曾就这两次工人斗争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通讯，交给特委，特委又转给省委，发表在北方区党刊《火线》上。这篇文章是斗争纪实，经过写得很详细，至于观点有无错误，那是另外一回事。

1934年11月，根据组织发展和斗争需要，省委决定将直南地区分别建立冀南和冀鲁豫边两个特委。与此同时，我即离开磁县到冀南特委工作，磁县的工作由李亚光接替。李到磁县半年许，因一个和他接头的工人告密出卖而被捕，押解保定监狱，直到“七七”事变才出来。当时净出叛徒，稍失警惕，就会吃亏。

当我在磁县时，任县的刘子厚就常到南官活

动，因为南宫县小学教员多，便于活动。还有开明地主，如杨绍先，他家虽是大地主，但是恨国民党，恨土匪，就投靠我们。他家有枪，我们常在他家印文件、藏东西或开会。我回冀南任特委书记，刘子厚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于光汉，民运部长是张霖之；团特委书记是小黑王（即王运昌，后来消极了），组织部长马国瑞，宣传部长薛振彦，还有小吉子。这时，冀南已有党团员一、二千名。

1935年搞暴动，分滏东滏西两片。刘子厚、刘振邦领一伙人在任县一带，时间比东片早些。我们在南宫搞。这年5月，我们想砸广宗局子，没有枪，只买了两打手榴弹和几个手电筒。那天晚上，原计划由广宗槐窝的一个党员带路，我领着人先隐藏在村外树林子里等他。其间由于有的同志在林子里直打手电，惊得村里鸡鸣狗咬，以为是来了土匪。等了半天，也不见带路的那个人来，我便进村去找，一进村，就被人们当土匪把我抓住捆起来。幸亏丁南同志见了，他是我们的区委书记，在村里卖棉花，和我认识，经他周旋说和才把我放了。结果，这次砸局子没能成功。

此后，我感到搞暴动没有枪不行。怎么弄来枪呢？当时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向地主征款，二是

组织小学教员捐款。如杨绍先一次就捐了他两个月的薪水。有了钱，就买了几十支枪。刘子厚他们原来就有枪。这样，两片都有了枪。由此看来，5月份暴动不能算失败，因为我们有了枪。

这时，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救国，宋庆龄在上海搞民族自卫会，发表“六大纲领”。我们在乡下搞抗日签名运动，组织流动图书馆。书是由上海党组织秘密发行过来，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封面印的是别的名字。此外，还搞过反盐巡斗争。

1935年8月，我们又组织暴动，这次干成了。之后，一直坚持到1936年2月。那时，我们基本上肃清了南宫等县的敌伪势力，先后摧垮了巨鹿的团城，南宫的王道寨、曹家庄等警察、民团局子；分粮吃大户更是在许多县开展起来，形成了赤色恐怖。当时给地主写信要抗日救国捐，他们不敢不拿，一拿就是数百元或数千元。那时候，省委正处经费困难时期，高文华（省委书记）他们住在天津租界，穷得不得了。我们冀南给省委汇款每次都是几千块钱。党团组织和群众武装也有较大发展，党团员有两千人，各种枪四百余支，经常活动在南宫、巨鹿、任县、尧山、广宗、威县、平乡一带。后来，敌人对我们进行疯狂镇压，宋哲元派来几个

军围剿，商震一个军驻扎邢台，冯占海一个军驻扎尧山。河北省的保安处长张某扬言“杀人八百，偿钱一万”。特别在南宫更是一个村一个村地进行包围，抓住了就铡头。南宫专员刘必达杀人最多，解放后被我们枪毙了。

八月暴动起来后，特委内部对斗争策略有过争论和斗争。一派以我为代表，主张稳妥一些，搞游击式，昼伏夜行，先农村后城市，搞城市先搞兵变，里应外合；另一派以省委巡视员李华生为代表，他胆大，王明路线的劲头更足。他说：“我们高呼一声，就会有几万群众参加我们的斗争。”会上斗争我，他让我写检查；我不服，就上告。1935年8、9月间，我与李到天津找省委打官司，高文华同志给断的。当时，高认为我的主张是对的，可也没怎么批评李华生。接着把李派到冀南接替了我的职务，把我调到保定特委书记。之后，我曾在党刊《火线》上发表过三篇文章，总结冀南工作，纪念“九·一八”和搞游击战争。

我到保定，先住在一个党员家里，他原是育德中学学生，失学在家。以后经交通接线，和任丘的“牛氏三杰”取得联系，我就以同学名义住在他家里。他家是富农，有盒子枪，我去之前，省委派去的傅贯一同志也在他家住着。傅的本事比我大，

不仅会卖书，还会看病，是个针灸先生，他是特委组织部长，牛文仓是军委书记。

1937年5月，我到延安参加白区代表会议。在延安汇报工作时，听说张霖之在冀南搞暴动闹得几个县都垮了，张也跑到永年隐蔽。党团员数目由两千多一下降到六百多人。从延安回来，中央决定建立自北京南至彰德的平汉线省委，由我任省委书记，领导保属、冀中、冀南和冀鲁豫边四个特委。组织部长是刘秀峰，宣传部长是李雪峰，还有杨秀峰、薛振彦，连我在内，省委共五个人。省委机关先在保定，日寇轰炸保定后搬到石家庄，留下张君、大眼侯（侯玉田）在保东，刘秀峰在保西继续活动。当时，北方局驻在太原阎锡山的办事处里，书记是杨尚昆，组织部长彭真，军委朱瑞。省委搬到石家庄后，驻在吕正操六九一团团部留守处。六九一团有三个营，二营在井陘看守军械库。我们原打算在井陘打开军械库，搞暴动，但因二营营长（是个党员）不听指挥，没有搞起来。这时，大眼侯在保东组织起两千人的支自卫军，吕正操就带着二营到冀中和大眼侯会合。我又先后派薛振彦、孟庆山也到冀中。此时，张君也与他们接上了头。以后鲁尧、孙志远也上那里去了。

我到石家庄布置了灵寿、赞皇的工作后，到太

原见到周总理，归来又与刘伯承联系到太行工作，接着建立了晋冀鲁豫省委，我任省委书记。这时，马国瑞派人和我联系，开辟冀南根据地。事先派了一个挺进队，之后，我又和陈再道带一个营同到冀南。晋冀鲁豫省委书记由李雪峰接任，我任冀南省委书记。以后，直到解放我一直在冀南工作。

李菁玉，河北省南宫县十里铺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冀南地区任县委、中心县委、特委、省委、区党委书记。建国以后，曾任农业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等职。十年浩劫期间，受林彪、“四人帮”诬陷迫害，于1972年3月19日含冤去世。1979年平反昭雪。

党在任县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

(1926——1936)

刘子厚

1926年至1927年，军阀为争夺地盘，连年混战，苛捐杂税重多，地方钱粮预征几年，造成农民经济破产，生活极其痛苦。

在这当儿，国共两党合作，组织了北伐革命军进行北伐。任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农协会”、“红枪会”，开始播下革命的种子，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农民协会是以贫雇农为主体的群众性组织，主要任务是打击土豪劣绅。县农协会主席是刘振河，其他负责人还有我和常子敬。最初，到这一带组织革命斗争的人是从大名、磁县来的，看情况是共产党员。红枪会也是由南方人来组织的。在任县一带以我和刘振河、常子敬为首曾领导红枪会斗土豪劣绅。攻县城打县府，配合革命军北伐，先后攻打过任县、巨鹿、邢台等城。红枪会占领了邢台城以后，先让刘振河、常子敬住在那里，我回去继续组织力量。正在这当儿，阎锡山的部队在邢台

将红枪会打散，伤了很多，连从南边来的领导人也牺牲了。刘振河、常子敬从城里逃出隐蔽起来。

不久，国民党统治者宣布农协会是非法的，强迫解散。这时，我们看到国民党和旧军阀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口头上虽讲“革命”，实际上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认识到，穷人要想翻身，只有跟着共产党，建立自己的革命队伍。可当时，光听说有共产党，却不知共产党在哪里。

1928年，国共两党决裂，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了中国，土豪劣绅重新抬头。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了。为了解除贫苦农民暂时的困难，我在村中建立了“互助会”，组织穷人们遇有修房盖屋、红白喜事等大项支出，互助互济摆脱地主们的乘机剥削。当时有40多人入会。

1929年，刘振河、常子敬从外地回来，这时。我们三人一方面在刘屯办了一所圣阳小学，购买了一批革命书籍，供先进知识分子阅读。另一方面，继续发展扩大互助会组织。这时尽管我们还没有参加共产党，可是人们及县里的一些绅士都把我们看作是共产党了。所以，这年秋后，陈存仁（我县早期党员，当时是党的负责人）同志与我取得联系，并介绍我加入共产党。

本年冬天，一个姓林的同志（可能是林平）来